

新世纪文学论稿 文学思潮

孟繁华 著

“新世纪文学”在不同的议论中悠然走过了十五年的历史，十五年的历史都发生了什么会有不同的叙事。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新世纪”的时间之光，照亮了我们此前未曾发现或意识到的许多问题，当然也逐渐地照亮了“新世纪文学”自身。从最初的对“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的质疑，逐渐转化为对当下文学、也可以理解为对近些年来文学价值认知的讨论，这是时间之光照亮的文学问题的一部分。无论持有怎样的观点，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新世纪文学”需要做出价值认知和判断。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新世纪文学论稿 文学思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文学论稿:文学思潮/孟繁华著.--北京:
现代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143-3997-0

I. ①新… II. ①孟… III. ①文学批评—文集 IV. ①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2118号

新世纪文学论稿——文学思潮

作 者	孟繁华
责任编辑	李 鹏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兼传真)
网 址	www.xdcbs.com
电子信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6.5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997-0
定 价	60.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新世纪文学”的经典化与当代性 / 001

新世纪十年：中篇小说论要 / 009

文学革命终结之后

——新世纪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 / 024

没有文学经典的时代 / 037

重新发现的乡村历史

——世纪初长篇小说中乡村文化的多重性 / 041

文学主流溃散后的乡土叙事

——近年来中国乡土文学的新变局 / 054

怎样讲述当下中国的乡村故事

——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乡村变革 / 064

知识分子的“背叛”、“出走”与“死亡”

——新世纪文学中的知识分子 / 082

边缘文化与“超稳定文化”

——当下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两种倾向 / 095

“文化乱世”中的“守成”文学

——新世纪中篇小说观察 / 112

生存世界与心灵世界

——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苦难主题 / 131

总体性的幽灵与被“复兴”的传统

——当下小说创作中的文化记忆与中国经验 / 144

怎样评价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 / 162

文学的速度与批评的速度 / 171

新人民性的文学

——当代中国文学经验的一个视角 / 176

这个时代的小说隐痛

——评《小说选刊》兼与一种文学观念讨论 / 183

战争文化的记忆与想象 / 194

新世纪文学：文学政治的重建

——文学政治的内部视角与外部想象 / 208

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

——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 / 219

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

——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 / 236

失去青春的中国文学

——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 / 252

“憎恨学派”的“眼球批评”

——关于当下文学评价的辩论 / 270

评奖与“承认的政治” / 277

新时期文学的半壁江山

——纪念《十月》、《当代》创刊三十五周年 / 283

一份杂志与当代中国文学现场

——《文艺争鸣》获奖作品集及文选序 / 301

《广州文艺》与都市文学

——写在《广州文艺》改刊之际 / 307

当代文学地理学与本土经验 / 311

文学大东北：地缘文学的建构与想象 / 315

在两个世界的边缘处

——新世纪海外华文小说心理症候的一个方面 / 319

文化研究与当下中国的批评实践 / 335

传媒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 / 342

中产阶级话语空间的扩张 / 358

媒体与文学的时尚化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演讲 / 370

“中国想象”与午夜的都市

——以沈阳为例 / 380

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 / 388

战斗的身体与文化政治 / 394

“伤寒玛丽”与“文化带菌者” / 399

左翼文学与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学 / 408

中国的工人阶级写作 / 411

——以平庄矿区的工人写作为例 / 411

女性文学的话语实践及其限度 / 414

“新世纪文学”的经典化与当代性

“新世纪文学”在不同的议论中悠然走过了十年的历史，对“十年的历史都发生了什么”会有不同的叙事。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新世纪文学”十年这束时间之光，照亮了我们此前未曾发现或意识到的许多问题，当然也逐渐地照亮了“新世纪文学”十年自身。从最初的对“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的质疑，逐渐转化为对当下文学、也可以理解为对近些年来文学价值认知的讨论，这是十年时间之光照亮的一部分问题。无论持有怎样的观点，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新世纪文学”十年需要做出价值认知的判断。但目前讨论因各种因素的制约，所达到的水准还不高，还仅仅限于情感态度和立场方面。但是，透过这些表面或感性的表达，其背后隐含的根本性问题，应该是对“新世纪文学”十年的当代性或经典化问题的认识。这既是一个对文学现实的认知问题，也是一个文学观念和批评的理论问题。

关于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我曾在不同的场合中表达过，特别是在几次编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现场讨论中。我认为，文学史的编写，就作品而言，一是要确立文学经典；一是要注意文学史经典。所谓文学经典，就是经过历史化之后、经过时间淘洗、经受了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用佛克马的话来说，“文学经典”是

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①所谓文学史经典，是指在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本身并不具有经典性的作品。如果不讲述这样的作品，文学史的叙述就不能完成。在当代文学领域，就“十七年”而言，它的“经典化”已经初步实现，虽然其间经历过“再解读”，但“三红一创保山青林”（《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山乡巨变》《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被普遍认为是“十七年”带有鲜明社会主义文学特征的文学经典；而《我们夫妇之间》《达吉和她的父亲》等，只是“文学史经典”。这样的作品虽然不具有经典性，但通过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我们才能讲述清楚社会主义初期阶段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学。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文学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或者说，刚刚跨进共和国门槛的部分作家、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并不明确如何书写新的时代，并不了解文学实践条件究竟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在“试错”的过程中，制度化地建构起了文学规约和禁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七年”时期，文学界有绝对权威话语权的拥有者。比如周扬，他对某部作品的肯定或否定，对该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或价值的评价，就有了基本的依据；比如茅盾，如果没有他对《百合花》的肯定，不仅不能终止对《百合花》的质疑或批评，而且《百合花》在它的时代究竟是怎样性质的作品，恐怕还是个问题。除此之外，西方经典文学的尺度和对我们的影响、不同时期的阅读趣味和意识形态要求、不同的文学奖项的颁发、不同的文学选本、一个时期对某些文学倾向的倡导等，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文学经典的指认或认同。这样看来，“新时期”三十年来文学经典的难以确立，重要的原因就不仅是时间问题，是“历史化”程度不够的问题，同时，也与没有绝对的权威批评家的认定以及上述提到的诸多因素都有程度不同的关系。因此，在各种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对三十年来文学经典的确认都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一方面这是正确的，一方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文学经典的确立，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并不仅仅是中国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的事情。这个过程并不是线性的按照现代历史发展的逻辑展开的，它的变化的全部复杂性并不完全在我们的想象和实践中。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夏志清的《中

① 佛克马、蚊布思著：《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

国现代小说史》，他的许多判断对重写中国百年文学史产生过重要影响。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评价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锺书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叙述中的地位，与鲁郭茅巴老曹比较起来并不那么重要。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中国大陆得以传播之后，许多人接受了他的看法。对夏志清的接受不只是抬高了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锺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引发了对现代文学史上主流作家的重新评价。这个现象呈现出的问题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已经不是中国文学自己的事情，国际汉学界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介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和格局，它使“经典化”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一方面，它使现代中国文学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注意，他们的评价带来了国际背景并提供了另一种参照；一方面，文学评价也为另一种意识形态所掌控，带来了文学评价的“对峙”格局。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并不阅读中国当代小说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在2006年对中国当代文学发表“垃圾”说。^①这一评价在国内批评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问题不在于顾彬语出惊人的评价，在此之前，国内文学界内外对当代文学的诟病在大小媒体上早已耳熟能详，但批评界充耳不闻坦然处之。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外国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负面评价，使文学界难以接受。这件事情使我们联想到80年代文学界的一个口号：“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是一个祈使句，在这样的表达中，我们总会感到这是一个文学弱势国家内心的失落或不自信。或者说，中国文学自觉地将自己设定在世界文学的总体版图之外，并表达了能够融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强烈愿望；但是，2010年1月1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美国《当代世界文学》杂志社，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召开的一次会议则被命名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在这个陈述句中，“中国”是陈述主体，“向海外传播”既是方向也是意志，它的坚定是不能动摇的。这是“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东方文化向西方输出”的想象在文学上的表达。但是，在这样的表达中我们可以看到，25年间中国和中国文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虽然我

① 《中国作家、批评家集体反击顾彬》，金羊网2006-12-17；另：2010年1月14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学术研讨会上，作家李洱说，在顾彬和他的交谈中顾彬说，他“从来不看中国当代小说”。一个不读中国当代小说的汉学家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可见其不负责任到了什么程度。

们已经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主体性，但是，通过顾彬“垃圾”说事件表明的是，当代文学的评价和经典化与国际背景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现代文学、六十年或近三十年来文学经典的确认尚且如此，对十年来文学经典指认的困难可想而知。因此，对当下文学或近十年来文学的评价，用我们过去理解的“经典”不可能成为一个尺度。我们更需要面对的是十年来文学的“当代性”问题。这个“当代性”是指文学的总体状况改变了“时间的总体化”逻辑，而是以一种不确定性和非逻辑化的方式在发展运行。许多文学因素以突如其来的方式改变了现代性时间总体化的预设，使本来就扑朔迷离的文学现状变得更加复杂。而恰恰是这种复杂的“整体性”构成了当下文学状况的丰富性和“当代性”特征。那么“新世纪文学”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是如何发生的，我以2009年长篇和中篇小说的状况为例来展开讨论。一方面，长篇和中篇小说创作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和评论的新的趋向和作品，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本土经验；一方面，“当代性”包含了更为广阔和丰富的内容，包括已成为“历史”的文学也在不同力量的支配下，强行进入了当代并构成文学当代性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夏志清对张爱玲的举荐所产生的影响，在2009年并没有成为过去。张爱玲的《小团圆》在2009年的出版，不仅是20世纪90年代“张爱玲热”在2009年不作宣告的延伸和不可忽视的存在的提示，同时也以“事件化”的方式，加剧了“新世纪文学”当代性的复杂性。2009年4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张爱玲的《小团圆》，据悉，首印三十万册顷刻销售一空。出版宣传指出：“《小团圆》以一贯嘲讽的细腻工笔，刻画出张爱玲最深知的人生素材，在她历史中过往来去的那些辛酸往事现实人物，于此处实现了历史的团圆。那余韵不尽的情感铺陈已臻炉火纯青之境，读来时时有被针扎人心的滋味。故事中男男女女的矛盾挣扎和颠倒迷乱，正映现了我们心底深处诸般复杂的情结。”它的出版，被称为是“全球三千万张迷翘首企盼”的事件，于是一时间里“张迷”们奔走相告。《小团圆》将经久不息的“张爱玲热”推向了2009年的高潮，并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选为“2009年十大图书”。张爱玲在大陆的阅读几经起伏，但通过电影《色·戒》和《小团圆》，可以肯定的是，她的“经典性”被最大化的同时也已经品牌“透支”。因此，在图书出版“策划化”的今天，她强行进入“当代”就远非是一个文学事件。

《废都》的初版距今已经十四年过去，它无论以哪种形式重新出版，都是一个重要的事件，都会引起读者和文学界极大的兴趣和关注。无论1993年前后《废都》遭遇了怎样的批评，贾平凹个人遭遇了怎样的磨难，都不能改变这部作品的重要性。我当年也参与过对《废都》的“讨伐”，后来我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当年的批评是有问题的，那种道德化的激愤与文学并没有多少关系。在“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背景下，可能任何一部与道德有关的作品都会被关注。但《废都》的全部丰富性并不只停留在道德的维度上。今天重读《废都》及它的后记，确有百感交集的感慨。在其他场合，包括在文学会议或文学讲座上，我都曾表达过：《废都》一定会被重新评价。这个看法，是源于对文化环境的分析和对《废都》的重新认识获得的。如上所述，在1993年代——社会大转型的年代，道德化标准还是文学批评的标准之一。《废都》中的性描写的不合时宜是不难想象的。但是，经过十几年之后，这部作品的全部丰富性才有可能重新认识。《废都》的重要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作为长篇小说，它在结构上的成就，至今可能也鲜有出其右者。长篇小说是结构的艺术，很多长篇小说写不好，不是作家没有才华、没有技巧和生活，主要是对长篇小说文体的理解有问题，也就是对长篇结构的理解有问题。但《废都》在结构上无论作家是否有意识，都解决的很好。二、小说在思想内容上得风气之先：贾平凹最早感受到了市场经济对人文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可以说，这个阶层自现代中国以来，虽然经历了各种变故，包括他们的信念、立场、心态以及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但从来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这个冲击对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太重大了。贾平凹感知了生活变化对他们精神世界的改变，于是才有了庄之蝶。1993年以来，长篇小说我们能记住几个人物？但我们都记住了庄之蝶。更重要的是贾平凹对庄之蝶的态度。我们不能说贾平凹对他的主人公是欣赏的，他只是用小说的方式呈现了他。庄之蝶最后的命运说明了贾平凹的态度。在那个时代，迷惑、困顿的不止是贾平凹，我们都不是先知，都在困惑和迷惘中。也正是这个困惑迷惘成就了作家的创作，却使批评陷入了迷途。《废都》的重新出版只是提供了我们重新阅读和评价这部作品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庄之蝶心态”在今天知识阶层的普遍性，我们可能会体会得更为充分，它提供了知识阶层精神当代性的一个范本。

当然，新世纪文学更值得关注的是本土经验的积累。在现代性的时间总体化

逻辑中，“新”是一个重要指标，“新”不仅清楚地标示了时间的变化，而且在理论上容易概括和掌握。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的变化除网络文学这个新媒体催发的文学形式之外，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变化的步伐越来越缓慢。文学形式革命虽然仍有可能性，但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旋转木马式的追新浪潮，形式革命已疲惫不堪。因此文学的变化呈现的是渐进性而非激进式的，这种缓慢的变化不易被粗糙的批评所察觉。而有些批评甚至连认真考察的愿望都没有。我仍以 2009 年的小说创作为例。长篇小说如宗璞的《西征记》、苏童的《河岸》、阿来的《格萨尔王传》、高建群的《大平原》、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张翎的《金山》等都受到了普遍的好评。但在文学的当代性可供谈论的可能还是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和曹征路的《问苍茫》。一个写历史；一个写当下。刘震云写历史并没有写“大历史”，没有执行“史传传统”的路线，甚至历史的背景都相当模糊。他书写的是两代人与“说话”的关系，说话是小说的核心内容。我们每天实践、亲历和不断延续的最平常的行为，被刘震云演绎成惊心动魄的将近百年的难解之谜。历史叙事大多是国家民族或是家族叙事，历史在这里是一个依托：没有历史就不能展开叙事。但在刘震云这里，“去历史化”表现在这只是一个关于个人内心秘密的历史延宕，只是一个关于人和人说话的体认。对“说话”如此历尽百年地坚韧追寻，在小说史上还没有第二人。无论是杨百顺出走延津寻女，还是牛爱国奔赴延津，都与“说话”有关。“说话”是一种交流，但更是一种“承认”。夫妻之间的关系，除了生理需要、传宗接代之外，“说话”就是最重要的形式。但老高和吴香香私通前说了什么话，吴摩西一辈子也没想出来；章楚红要告诉牛爱国的那句话最后我们也不知道，曹青娥临死也没说出要说的话。没说出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当然，那话即便说出来了，也不会是惊天动地的话。在小说中一定要这样表达，只是小说的技法而已，这和《红楼梦》中黛玉临死也没说出宝玉如何、《废都》中的有许多空格没有什么区别。需要破译的恰恰是已经说出的话，分析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说话”是如何形成政治的。这些普通人是 中国最边缘或底层的群体，在葛兰西的意义上他们是“属下”，在斯皮瓦克的意义上他们是“贱民”，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是没有话语权利的阶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说被排除在历史叙事之外，是刘震云发现了这个群体“说话”的历史和隐含其间的伦理、智慧、品性等，最根本的是，说话就是他们的日子，他们

最终要寻找的还是那个能说出话的人。刘震云虽然写的是历史，但他是通过当代发现了历史，发现了人性的普遍性。人与人内心真正的隔膜是被当代人更深刻地体悟和发现的。

反映当代生活并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下公共事务的作品，最有影响的作品应该是曹征路的《问苍茫》。多年来，曹征路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地带，密切关注着 30 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场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社会大变革。他的作品不是那种花团锦簇、莺歌燕舞式的时代装饰物，也不是貌似揭露、实际迎合的所谓“官场文学”。他陆续发表的《那儿》《霓虹》《豆选事件》以及长篇小说《问苍茫》等，在以“现场”的方式表现社会生活激变的同时，更以极端化的姿态或典型化的方法，发现了变革中存在、延续、放大乃至激化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曹征路承继了百年来“社会问题小说”的传统，特别是劳工问题的传统。不同的是，现代文学中包括劳工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小说”，是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背景下展开实践的，它既是五四时代启蒙主义思潮的需要，也是启蒙主义必然的结果。在那个时代，“劳工神圣”是不二的法则，劳工利益是启蒙者或现代知识分子坚决维护或捍卫的根本利益。但是，到了曹征路的时代，事情所发生的变化大概所有人都始料不及，尽管“人民创造历史”、“工人阶级”、“社会公平”、“人民利益”、“劳动法”、“工会”等概念还在使用，但它们大多已经成为一个诡秘的存在。在现代性的全部复杂性和不确定中，这个诡秘的存在也被遮蔽得越来越深，以至于很难再去识别它的本来面目或真面目。无数个原本自明的概念和问题，在忽然间变得迷蒙暧昧甚至倒错。于是，便有了这个“天问”般的迷惘困惑又大义凛然的《问苍茫》。

我还想指出的是，新世纪以来文学成就最大的是中篇小说，这是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文体。它的整体成就我在其他场合论述过。在 2009 年的中篇小说创作中，我尤其需要谈到晓航的《断桥记》。^①这是一部发生在城乡连接处的小镇的故事。小镇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小桥流水、青石小路、淑女雅士、贞节牌坊……都是中国文化的奇观。既有静谧的传统生活，又与都市一箭之遥，文化深厚又不事张扬。文学中的鲁镇、乌镇、天迥镇，都是如此。《断桥记》中落玉川

① 晓航：《关于〈断桥记〉》，中国作家网，2009 年 10 月 16 日。

虽然历史不长，但它的小镇属性与悠久历史的小镇并没有区别。在这里上演的故事意味深长，让人唏嘘不已。在《断桥记》中，传统就是诗意。不仅落玉川的自然地貌一山一水如此，被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人亦如此。落玉川的缔造者龙秋泉和他的女儿龙姗姗被描绘出的形象就是想象的传统符号。“现代”文明虽然也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但这个文明的背后似乎总与阴谋联系在一起。我更感兴趣的是晓航在这个纯属虚构的故事里，对传统与现代的态度。

新世纪以来，包括乡土文学、女性文学、都市文学甚至“官场小说”，都不同程度地提供了本土经验，即使是不那么成功的经验，一起构成了新世纪文学的当代性。无论是成功或不成功，都不应是对新世纪文学简单的价值判断，而应该是我们讨论问题的起点：这些作品或现象为什么会是这样。因此，在文学的当代性正在发生或生成过程的时候，在它还没有经过历史化或经典化过程的时候，轻率地否定新世纪文学的价值，就不仅是不恰当，而且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当然，在为新世纪文学做出辩护的时候，我并不是认为它不存在问题，没有问题的文学时代是不存在的。但是，这需要在整体肯定新世纪文学价值的基础上来讨论。

2010年1月18日于北京寓所

原载《文艺争鸣》2010年3期

新世纪十年：中篇小说论要

2011年的春天，北方持久干旱，日美、韩美在联合军演，日俄北方四岛主权之争不断升级，埃及、利比亚局势动荡，中国动用陆海空力量撤离人员，从欧洲左派领袖到国内精英，密切关注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在国内，“两会”即将召开，代表们已经启程陆续抵京，“十二五”是政治生活的核心话题；在文化领域，电视媒体更感兴趣的是“春晚”或赵本山及弟子们，其他媒体关于“春晚”及赵本山小品的口水战业已拉开帷幕；这一时段最具号召力的电视连续剧，是邓超、张嘉译、董洁联合主演的《你是我兄弟》。在日常生活领域，关于文学的话题几乎完全消失，这就是文学在这个时代的遭遇。当然，被我们描述出的肯定是这个时代生活的表面，大众传媒不那么关心人的精神世界，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已经潜隐到生活的最深层。如果是这样的话，日常生活不再谈论文学无可厚非。无论我们怎样强调当今文学的重要性、强调某个文体取得了怎样高端的艺术成就，都不能改变文学已然“小众化”的事实。文学与飞涨的物价、与攀升的房价、与不断枯竭的资源、与环境污染和不安全的食品比较起来，远不重要。但是“小众”也在证明终究有人还需要文学，关于文学的真相终还需要有人说出。这也正是我们坚持研究和讲述文学的最后理由，尽管是如此的勉为其难。

“十年”是一个时间计量单位，十年可以看出文学的发展和变化。而且多年来《文艺争鸣》一直倡导和坚持“新世纪文学研究”，并取得了蔚为大观的成果。中篇小说作为一个文体，代表了十年来高端艺术的成就，总结它的成就和问题，对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意义重大。需要说明的是，一篇文章远不可能穷尽十年中篇小说的全部成就和问题，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一、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依然是新世纪中篇小说最重要的书写对象。刘庆邦、毕飞宇、胡学文、葛水平、孙惠芬、温亚军、郭文斌、张学东等，是这个领域的重要作家，他们的作品构成了这个时代中篇小说的主力阵容。

毕飞宇新世纪以来先后发表了《青衣》《玉米》《玉秀》《玉秧》《家事》等作品，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下中国这一文体最优秀的作家。《玉米》应该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百年中篇小说史上，也堪称经典之作。《玉米》的成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评价和认识，但是，它在内在结构和叙事艺术上，在处理时间、空间和民间的关系上，更充分地显示了毕飞宇对中篇小说艺术独特的理解和才能。

《玉米》的时间是玉米情感“疼痛的历史”。经验表明，人在生理上感觉到身体的哪个部分、关注哪个部分，哪个部分就出了问题。在情感愿望上也是一样。王连方的妻子施桂芳生下“小八子”后，有一种“松松垮垮”的自足和“大功告成后的懈怠”，连续生了七个女儿的“疼痛的”历史的终结，“小八子”是疗治施桂芳唯一的“良药”。从此她就从王家和大王庄作为“话题”的处境中解放出来。甚至不是这个“话题”主角的玉米，也有了一种扬眉吐气和“深入人心”的喜悦，她是替母亲“松了一口气”。但是，“小八子”的到来却没有终结玉米“疼痛的历史”。父亲王连方与大王庄多个女性的不正当关系，仍然是玉米的痛楚，她为母亲和这个家感到疼痛。因此“玉米平时和父亲不说话，一句话都不说。个中原委王连方猜得出，可能还是王连方和女人的那些事”。玉米不仅不和父亲说话，而且“背地里有了出手”。那些和王连方不干净的女人，玉米就是她们的“克星”，她抱着小八子站在有些人家的门口，用目光羞辱和蔑视那些和王连方上过

床的女人，于是这些女人对玉米几乎闻风丧胆。这些举动是玉米为母亲“复仇”，也是疗治自己“疼痛”的手段。

当然，这还不是玉米的切肤之痛。玉米真正的疼痛是其个人的情感史。彭家庄箍桶匠家的“小三子”是个飞行员，叫彭国梁，在彭家庄彭支书的介绍下，和玉米建立了“恋爱关系”。尽管是一个扭曲畸形的年代，但玉米还是经历了短暂的爱情幸福。与彭国梁的通信，与彭国梁的见面，使玉米内心焕然一新。爱情改变了玉米眼前的世界，因王连方和那些女人带来的疼痛也得到了缓解。彭国梁的来信，“终于把话挑破了。这门亲事算是定下来了。玉米流出了热泪”。玉米不仅为自己带来了荣耀，也为王家和王家庄带来了荣耀。但爱情的过程仍然伴随着痛苦，不止是思恋的折磨，还有玉米文化的“病痛”。她只读过小学三年级，“那么多的字不会写，玉米的每一句话甚至是每一个词都是词不达意的。又不好随便问人，这太急人了。玉米只有哭泣”。于是，“写信”又成了玉米挥之不去的隐痛。彭国梁终于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一瓶墨水、一支钢笔、一沓信封和信笺以及灶台后的亲密接触，玉米幸福得几近昏厥。但玉米还是没有答应彭国梁的最后要求，她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彭国梁又回到了天上。幸福是如此的短暂。更让玉米难以想象的是这几乎就是玉米一生的全部幸福。

王连方近乎疯狂的婚外性行为终于迎来了报应，他触了高压线，秦红霞是现役军人的妻子。王连方被“双开”了。王连方四十二岁出门远行学油漆匠。王家从此家道败落，不幸接踵而来。先是玉秀和玉叶惨遭蹂躏，接着是彭国梁的飞机越飞越远直至没了踪影。最后，玉米把自己交给了一个五十多岁即将丧妻的公社革委会的郭副主任。心气高傲、曾经如花似玉的玉米，就这样经历了自己惨痛的情爱历史。对她来说，一切都没有开始，但一切已经结束了。她此后将要经历的生活，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融入了可以想象的无论是大王庄或其他任何地方。《玉米》的社会土壤是腐败的，但作为文学土壤又是坚实的。毕飞宇就在这坚实的文学土壤上塑造了玉米。他将玉米情感疼痛的历史书写得悠长而悲怆，就像利刃缓慢划过皮肤，绽放的是带血的花朵；他在一个虚拟的空间——战机飞翔的天空，和一个切实的空间——大王庄的世俗世界，为玉米的虚幻想象和现实的处境提供了进退自如的广阔天地；软弱麻木的民间社会，展现了权力的力量和它坟墓般的幽暗。玉米从自强、自尊、多情到妥协、无奈和冷漠的心路历程，使我们看到